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



中国图书情报学四十年

李广建 主编

非外借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



中国图书情报学四十年

李广建 主编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图书情报学四十年 / 李广建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

ISBN 978-7-100-17202-8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情报学—概况—中国—1978—2018 IV. ①G250-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2348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

中国图书情报学四十年

李广建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202-8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40 1/32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¼

定价: 65.00 元

本书由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及
“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资助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

编委会

总 顾 问：郝 平 林建华 高 松

总 主 编：王 博 杨 河

编委会主任：杨 河

副主任：关海庭 文东茅 汪建成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晓宇 贾庆国 李广建 陆绍阳

孙熙国 姚 洋 俞可平 张 静

张守文 郑晓瑛

项目统筹：佟 萌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

总 序

杨 河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作为其思想反映和理论概括，中国社会科学也在守正创新中与时俱进。认真梳理其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总结其历史经验与理论成果，对于我们面向未来，继续砥砺前行，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无裨益。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思想源远流长，但是将它们作为学科即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来对待，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发展迄今，有五个重要

的转变时期。^①

第一个转变时期：从“书院四部”到“学堂七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清朝在帝国主义入侵下的节节败退和妥协，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带入了穷途末路，作为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儒学随即陷入危机。在向西方学习、谋强图变的努力中，西学东渐进入了中国思想界。

中国古代的学问讲究博通，旨在培养“通才”，要求研读经、史、子、集，晚清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四部典学”有何“用处”的质疑，转向了“经世实学”的研究，然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传统“经世实学”仍难以“匡时济世”，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提出“中体西用”“师夷制夷”，在开启大规模翻译输入“有用之学”——西学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教育的学科建设之途。

中国古代的学校，没有学科和层次之分，启蒙教育之后即可进入书院，主要的学问大都包含在儒学之哲学思想中，在与西方学术思想的对话和碰撞中，西学的逻辑结构显示了一种强势的知识力量，中国学术思想一方面被重新解读，另一方面也得以重新整理和组合。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化过程，有待于与此相适应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当这些条件比较具备的时候，已经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了。在这之前，以甲午战争为界，这个转化过程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演变。

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被理解为中国的人文（伦常名教）为“体”，西方的科技为“用”，因此，对西学的译介，大都为自然科学诸

^① 本节的写作主要参考和借鉴了肖朗：《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型》，《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6期；纪宝成主编：《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学科,如天学、算学(即数学)、重学(即物理学)、热学、光学、电学、化学、地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为“师夷制夷”,一些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建立了起来,最初有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又先后有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开办。这些在外来因素诱发下创办的学堂,是中国学人接受“分科治学”的西学观念而展开的最初的办学实践。

冯桂芬在1861年撰写的《采西学议》中,将西学称为有“格致之理”的“舆算之学”,分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将中学分为经学、史学和古学,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术分科考虑,其要义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此后,王韬、陈虬、郑观应等又继之对这一问题以及中学西学的教学重点和比例结构进行了探讨。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日本的崛起,使中国人转移了向欧美学习的眼光,开始以日本为榜样,从器物层面的图强转向了制度层面的图强,中国教育深受影响。一方面,对西学更为重视,由胡聘之、秦绶章等倡议,经礼部复议后于1896年颁行各省实行的学科方案,将以往的“四部典学”扩充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译学六大门类,除经学、史学外,其余四门皆吸纳了西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开始注重研究中学与西学的融通结合,这与对西学中人文社科地位的重新认识密切相关。

针对洋务运动专注技艺的教育思想,梁启超指出:“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闻焉。”^①张之洞也认为,“西学亦有

^①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104—105页。

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①这种对“西艺”和“西政”的区分,既是对西学之“用”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近代学科两大知识体系——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分类的最初意识。

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进一步做了尝试解构中学西学二元结构的努力,将所讲授的课程分为两类:“溥通学”和“专门学”,前者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后者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两类之中,经学、诸子学、掌故学系中国传统学术,公理学、公法学、格算学系西方近代学术,中西学术在其中融汇结合,这是一个新的综合性学科分类考虑,为新式学堂课程设置开了先河。

1898年,以“西政为要”的戊戌变法在清王朝内部发生,一时风生水起,然保守力量的过于强势使光绪皇帝及其一班学者、大臣的努力终于付之东流,在103天的轰轰烈烈之后,一切似乎又归于旧态,但却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借鉴。1898年至1911年的最后十余年,清王朝做了自我挽救的最后努力,一是在实行“新政”过程中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二是在“五大臣出洋”后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虽均为不得已而为之,然却在为中国政治另辟新径的同时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开了转折之途。继1895年、1896年、1897年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浙江求是书院先后成立之后,在戊戌变法的风雨中诞生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幸存了下来,中国大学教育的学术分科在这里从探索走到了初建。

早在1896年,孙家鼐在奉命筹办京师大学堂上奏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就按照“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精粗”的方针,拟定了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545、570页。

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十科立学的章程，确立了京师大学堂分科立学的基本格局。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进一步论证，“夫学至于专门止矣，其所谓大学者”^①，只有注重专门，才能“诸学并立，大学岿然，人才不可胜用”^②。由梁启超执笔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的教育分为预科和本科，分别学习“溥通学”和“专门学”。预科是基础教育，中西科目兼顾；本科是专门教育，以西学为主。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孙家鼐和梁启超的方案都未能实施，直到1901年在清王朝开始实行“新政”改革时，张之洞等为重开京师大学堂而上奏的《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才又以日本大学的学科设置为蓝本，提出京师大学堂分设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的“七科方案”。

为弥补这一方案中未设“医学”和“商学”的不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张百熙拟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业、商务、医术七大学科，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法定形式颁布的学制，但由于没有将“经学”单独列为一科，被认为有违“中体西用”，受到质疑而搁置，未真正实施。

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将“经学”置于群科之首，形成了经、法政、文、医、格致、农、工、商八大学科四十三门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京师大学堂在1910年正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6页。

②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7页。

式确立了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理科)、工科、商科、医科的“七科立学”的教育教学体系,至此,初步完成了从传统“书院四部”体制向近代“学堂七科”体制的转化。

第二个转变时期:从“独尊经学”到“兼容并包”。

当大臣们还在固守“经学”的“至尊”地位时,清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原则的预备立宪由于其保守性和欺骗性,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满汉之间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引发了社会动荡,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催生了新的政治制度。

1912—1913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性质的学制,废除了原有的读经讲经课,充实了自然科学知识,规定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与男女同校制度。

在推行新学制的同时,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次年1月12日又颁布了《大学规程》,规定大学设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以文科、理科为主,凡办大学,必须或者并设文理两科,或者设立文科并法商两科,或者设立理科并医、农、工任一科。

教育部的这三个文件,在新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扭转了“中体西用”在教育上的规范。一是废除忠君尊孔的宗旨,禁用清朝教科书,接受西方近代大学课程体系;二是废除奖励科举身份,实行学位制,以成绩论进退;三是废除官吏制度,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

西方学科的大规模进入,一方面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西学除了在自然科学中一统天下外,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与传统中学平分秋色,西学教育学的理念由此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改造了原有的学术话语体系,西学理性主义的认知倾向、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概念化的逻辑结构、定量的数学分析方法等等，也由此开始深刻影响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未来走势，开启了中国教育和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历程。

当然，正如历史上一切变革的发生一样，这个历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辛亥革命后的七年中，先后发生了袁世凯、张勋、段祺瑞的三次文化复古运动，每一次都重提尊孔读经，但皆因逆时代潮流而未能得逞。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中国教育界的那些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严复。

作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康有为语）和《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在介绍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过程中，悟出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精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并将它们应用于北京大学的建设。严复提出，大学之根本，在“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办学之方针，在“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四年以后，蔡元培主政北大，借鉴德国大学的经验，在北京大学推行教育教学改革时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对严复办学方针的继承和发扬。循着这一办学方针，蔡元培以北京大学为试点，对学科布局 and 结构进行了重要调整。首先，在“学”与“术”亦即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上，蔡元培提出了“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重于术”的原则，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其次，在文科和理科的关系问题上，蔡元培提出改“门”为“系”，废除文科、理科之名，分别将两科所属的14门专业调整组建为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地质学系、中文系、史学系、哲学系、经济系、政治学系、法学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最后，在学科教育的层次上，蔡元培提出招收研究生，建立研究生学科教育平台的主张，在北京大学开设了研究生教育课程。始于严复、行于蔡元培的北大改革，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之先河，其经

验和成果影响至今。

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门学校组织法》《专门学校规程》,对1912年和1913年的三个文件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借鉴欧美的中国大学制度基本确立。后来,一是在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上,又通过一些补充文件进行了充实:规定综合大学设学院、系,为三级管理,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为两级管理;二是在学位制度上,规定国立大学可以设立研究机构,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实行分类分级培养;三是在课程建设上,明确课程建设以学科为中心,按照“厚基础、严质量”的原则,规定了文、理、法、工、农、商六类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这些制度化的建设,直接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第三个转变时期:从西方模式到“以俄为师”。^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高等教育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指导思想上也随之变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基本的要求。

1949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提出了教育改革任务,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主流。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规定全国高校从一年级起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力量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学研究组,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由此,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开始取代过去的欧美高等教育模式进入了中国。以法学为例,1949—1959年间共出版译作165种,基本上都是苏联的法学著作

^① 参见纪宝成主编:《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和教科书,这一时期的法学理论、法学体系、法律机制以及法制实践的方法等,无不沿袭苏联。

第四个转变时期:从教育改革到教育革命。

1953年,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编制“一五”计划和引进苏联156个大中型项目的同时,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进入了中国,教育也被纳入其中。

在应用苏联的经验和方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中国实际情况“水土不服”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提出了要“以苏为鉴,走自己发展道路”,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初步经验和理论,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①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55页。

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

在“以苏为鉴,走自己发展道路”这个总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高等教育也开始了扭转全盘苏化的改革进程,但是这个过程很快就出现了曲折。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中忽视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的问题也反映到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一方面,高等学校数量盲目扩大,使得办学质量下降较大;另一方面,专业设置盲目增加,又使得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口径不合理地收窄。

为了纠偏,1961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十条”,在学科设置上,要求“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应根据国家的需要、科学的发展和学校的可能条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件来决定。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划分不宜过窄。每个学校应该努力办好若干重点专业。专业的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196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发布了《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和《高等学校绝密和机密专业目录》,这两个专业目录根据“宽窄并存,以宽为主”的原则,一是将1962年已经增加到的627种专业压缩到432种,二是适当调整了一些专业的培养目标。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专业过窄的问题,但是作为1949年以后第一个由国家统一制定的高等学校专业目录,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其较齐全的专业种类设置为以后的进一步补充完善奠定了基础。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中国高等教育在调整改革中的发展进程。“文革”期间,教育和其他领域一样,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第五个转变时期:从重新起步到跨越式发展。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立了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拨乱反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1977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高等教育在“回归”中重新起步。一些在历史上被错误取消的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等得以恢复重建。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整个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根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提出要解决“专业设置过于狭窄”问题,这就需要逐步消减和改造一些陈旧落后的专

业,增加和创立一些具有重要前沿性和现实性的专业。“如何进行”成为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整合资源,中国一些规模较大的高校在学科组织的构建上开始突破“系—教研室”的模式,恢复和创建学院。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进一步扩大了高校的自主办学权。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学科管理条块分割的问题,教育部在推动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中进行了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的新一轮大规模院系调整,通过共建、合作、合并等形式,重组了一批高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与此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高等学校专业目录进行了多次调整,2000年以前有三次较大幅度的调整。

第一次是1987年的调整,这次调整的重点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耽误和改革开放初期匆忙上马分别造成的专业缺口和专业混乱问题,专业总数从1982年的1343种减少到671种,其中人文社会科学214种,理工科325种,农林75种,医药57种。恢复和增设了文科、财经、政法类中一批长期比较薄弱的专业,加强了一些如管理类的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的专业。通过专业目录修订,明确了专业划分与设置的基本原则。这是1963年9月发布《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后第二次对高校专业目录的全面修订,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专业设置混乱的问题,专业名称和专业内涵得到整理和规范。

第二次是1993年的调整,这次调整的重点是解决专业归并和总体优化的问题,全部专业分为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十大门类,下设71个二级学科。经过调整,专业总数从之前的813种压缩至504种,其中含有56种跨学科门类的专业,形成了体系完整、统一规范、比较科学合理的本科专业目录。

第三次是1998年的调整,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改变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按照“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本科专业目